



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主办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6

巴蜀文化研究集刊

段 渝 主编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巴蜀文化研究集刊

巴蜀文化研究集刊

第 1 卷 第 1 期

巴蜀文化研究集刊



巴蜀文化研究集刊



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主办

巴蜀文化研究集刊

6

段渝 主编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蜀文化研究集刊·6/段渝主编. —成都:
巴蜀书社, 2011.9
ISBN 978-7-80752-884-5

I. 巴… II. 段… III. 巴蜀文化—研究—丛刊
IV. K872.7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2527 号

巴蜀文化研究集刊 (第六卷)

段 渝 主编

责任编辑	周文炯 王群栗
封面设计	张 科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翔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260mm×185mm
印 张	19.375
字 数	500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884-5
定 价	40.00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科联系调换

巴蜀文化研究集刊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办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李学勤 项 楚

主 任 李 诚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万光治 王 毅 李 诚 刘 弘 林 向 段 渝

段志洪 侯德础 高大伦 舒大刚 蔡东洲 黎小龙

主 编 段 渝

目 录

· 历史研究 ·

- 成都平原古蜀的历史与文明 段 渝 (3)
- 古蜀王国的都城和疆域 段 渝 (24)
- 先秦巴蜀手工业研究概述 邹一清 (35)
- 金沙遗址蛙型金箔与蛙崇拜源流初探 屈小玲 (45)
- 巴蜀牌坊铭文所见清代农民暴动与起义初探 黄尚军 (54)
- 长江流域史前酋邦的战争
——暨与中原地区比较 李竞恒 (63)

· 考古研究 ·

- 金沙遗址的初步分析 江章华 (73)
- 金沙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认识 周志清 (85)
- 龙门山地区史前遗址分布的地质学观察
——“5·12”汶川大地震对四川史前考古的几点启示 陈 剑 (95)

· 文学研究 ·

- 扬雄《蜀都赋》释疑 熊良智 (127)
- 司马迁、班固对文翁化蜀的认识 房 锐 (131)
- 关于《汉书·循吏传》所录文翁化蜀史料的探讨 房 锐 (135)
- 关于司马相如故里问题的思考 房 锐 (139)
- 二十一世纪以来司马相如研究成果述评 房 锐 (144)
- 异代知音，人生偶像
——浅论唐代文人的相如情结 张 海 (153)

· 艺术研究 ·

- 四川画像砖在中国美术上的地位 范小平 (161)

四川崖墓石刻艺术在中国汉代美术考古中的地位	范小平 (178)
广汉古代文物艺术述略	邱登成 (200)
论刘东父的书法与书学思想	吴维羲 (207)

• 民族与民间文化 •

巴蜀园林的特点刍议	
——例说四川东汉画像砖所表现的巴蜀园林	林 向 (219)
文化全球化对少数民族地域文化的冲击	
——以中国西南民族为例	屈小玲 (228)
巴蜀民间艺术作为他者	
——艺术人类学视野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杨 静 (236)
成都—藏区之旅：1867年一个欧洲人探寻商路札记（摘译）	
..... [英] T. T. Cooper 著 屈小玲译 (242)	

• 语言研究 •

韩语与上古汉语对应词举例	周及徐 (251)
四川方言亲属称谓的特点	陈 颖 (256)

• 传记研究 •

张咏传校笺	张 海 (267)
张俞传校笺	张 海 (274)

• 会议综述 •

“长江·三峡古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九届年会”主要学术观点综述	
.....	邹一清 (281)
新资料·新视野·新方法	
——藏彝羌走廊暨中国西部石棺葬文化研讨会综述	陈 剑 (285)
四川地区西汉土坑墓研究与中美考古差异认知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举办学术沙龙侧记	陈 剑 邱 艳 (304)

历史研究

成都平原古蜀的历史与文明

段 渝

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时代^①，也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文明起源形成的时代。

成都平原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古蜀文明是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结构中的重要一元，是夏商时代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卓越代表，在中国文明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一、先秦时期成都历史的时空范围

（一）古蜀史的时空范围

1. 古蜀史的时序

古蜀历史的开端，在古代有三种不尽一致的说法：第一种是在战国汉晋间流传的关于古蜀起源的传说，记载基本一致，大体为：“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至黄帝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喾，后封其支庶于蜀，历夏商周。”^②第二种是在成汉东晋间蜀中史学家常璩的名著《华阳国志》里，把先秦汉晋众多史籍中的“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改成了“蜀之为国，肇于人皇”，蜀的起源早于黄帝为其子昌意娶于蜀山氏的年代^③。第三种是在唐代大诗人李白的笔下，把蜀的起源直接同蜀的开国连在一起，说成是“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④，蚕丛、鱼凫既已渺茫无征，遑论人皇与黄帝。

人皇，是战国两汉之间兴起的讖纬学说中的说法，战国以前古文献并没有人皇之说，基本上属于晚出不可信的说法。因此，说古蜀史开端于人皇是没有根据的。古蜀史肇端于黄帝的说法，其实也是正误参半。既然黄帝为昌意娶蜀山氏之女，那么就已经表明，这支被称为“蜀”的族群，早在黄帝时代就见称于世了，而蜀的起源，自然还应该更早，早于黄帝的时

① 先秦时期，是指中国历史从史前到公元前 211 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这段时期。

② 见《世本》、《山海经》、《蜀王本纪》、《本蜀论》、《华阳国志》等。《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也有黄帝为其子昌意娶于蜀山氏的记载，但无人皇之说。此段引自《太平寰宇记》卷七二，文中“帝喾”，为“帝颛顼”之误。

③ 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文中“帝喾”，亦为“帝颛顼”之误。

④ 李白《蜀道难》。

代。不过，蜀的起源与蜀的开国不是一回事，起源是指蜀这支族群的起始，开国是指蜀这支族群确立统治机器，建立酋邦或国家。常璩认为蜀早在黄帝以前的所谓人皇时就已开国，是用讖纬的说法描述古蜀史，自然是不可信的，但他认为古蜀史的开端早于黄帝时代，却是符合古蜀的历史实际的。先秦汉晋的历史文献每每记载蜀人自称为黄帝之后，那是因为黄帝之孙帝颛顼出于蜀山氏的缘故，所以历代文献记载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而蜀人也自称为黄帝之后。至于李白的说法，则是把蜀的起源与蜀的开国混为一谈，自然不能作为古蜀史开端的证据。

既然蜀山氏早在黄帝时代就已见称于世，那么，黄帝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又是处于什么年代呢？这个问题如果仅从历史文献上看，黄帝时代属于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也是史前向文明过渡或转变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时序位置在夏代以前，处于五帝的首位，但是具体年代不明确。如果从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角度看，黄帝时代相当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

所谓龙山时代，是考古学上关于史前文化分期的概念，相当于公元前26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一段时期。在这个时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地的考古学文化都有明显的进步，具有相似的发展水平，并且相互之间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因而被统称为“龙山时代”^①。那么，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与古史上的黄帝时代是什么关系呢？所谓黄帝时代，其实相当于龙山时代的较早时期。对此，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说。

首先，从考古学上看，在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之间，有一个铜石并用时代，它的早期相当于仰韶文化的晚期，而它的晚期大体上与龙山时代相当。从古史上看，“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②，所说以石、玉、铜为兵的三个时期，分别与考古学上的石器、铜石并用和青铜三个时代相吻合，表明“以玉为兵”的黄帝时代，大约就相当于铜石并用时代。不过，这个“以玉为兵”的时代，只是指铜石并用时代的晚期，却并不包括其早期。因为，所谓“以玉为兵”，反映的是一个特殊的“玉器时代”，它在中国考古学上并不具有普遍性，仅仅是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和长城以北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时代特点。“黄帝之时，以玉为兵”出自《越绝书》，而《越绝书》所记载的正是长江下游吴越之地的历史及其古史传说，可见这个记载表现的是东南地区的古史，它与良渚文化不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是完全吻合的。作为东南地区史前考古上的这个玉器时代，如前所述，恰恰与龙山时代即铜石并用时代的晚期相当，而与仰韶时代的晚期并不同时。于此可见，古史上的黄帝时代，就是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

其次，龙山时代上下数百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黄帝时代究竟处于这个时代的哪一阶段呢？我们知道，在古史传说中，黄帝、昌意、乾荒、颛顼之后分化为几大支系，其中的鲧、禹一系便是夏王朝的先公。对应于考古学，二里头文化（夏文化）之前的是中原龙山文化，则鲧的时代应为龙山时代的晚期。据《世本》记载：“鲧作城。”恰恰在龙山时代的晚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以及辽河流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城堡，与《世本》的记载正相吻合，这不是偶然的，它表明古史传说包含真实可信的历史内容，不容轻易否定，同时也表明鲧的时代确实是龙山时代晚期这一事实。既然如此，那么早于鲧在世数百年的黄帝，其

^① 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

^② 袁康：《越绝书》，卷一一。

所处时代必然就是龙山时代的早期。

最后，从古史上看，黄帝时代是中国史前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不但社会分化加剧，战争加剧，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和重组加剧，日益出现文明与国家起源的诸因素，而且在物质文化和科学技术上还产生了许多新的发明创造，如《世本·作篇》记载的“作市”、“作兵器”、“作煮盐”、“始穿井”、“作旃”、“作冕旒”、“作占日”、“作占月”、“作占星气”、“造律吕”、“作甲子”、“作算数”、“作调历”、“作书”、“作图”、“作衣裳”，以及其他诸多发明创造。考古学上，恰恰是在龙山时代的较早时期，各地文化出现了若干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与古史传说中黄帝时代的若干特征基本能够相互对应，如这个时期铜器的较多发现以及制铜技术的进步，与古史所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的传说有着内在联系^①，而战争的加剧和各地文化的普遍进步以及相互之间交流的扩大等，也可以从这一时期各考古区系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和相互影响中得到确切证明，社会分化的加剧则是这一时期考古学上常见的确定不疑的事实。由此可见，黄帝时代是龙山时代的较早时期，其年代大致在公元前 2500 年左右。

历史文献既然记载黄帝为其子昌意娶于蜀山氏，那么蜀山氏的年代就应与黄帝同时，在公元前 2500 年左右，而蜀的起源就应在公元前 2500 年以前。

大约以黄帝时代为开端，古蜀地区进入文明起源时代，考古学上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就处在这个时代。这同时也是古蜀酋邦社会的形成时代，是古蜀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时代，古蜀历史上的蚕丛、柏灌和鱼凫等“三代蜀王”的角逐争雄就发生在这个时代。

在距今 4000—3700 年左右，即在中原夏王朝兴起的时期，成都平原三代蜀王的角逐争雄也基本结束，鱼凫王在今四川广汉三星堆建立起第一个古蜀王朝，古蜀文明逐步走向兴旺发达。古蜀鱼凫王朝的年代约在夏代至商代晚期。这个时期，古蜀青铜文化走向兴盛，古蜀文明逐步走向成熟。在商周之际，即距今约 3000 多年前，古蜀王国的政治史上发生了一次王朝更迭，来自朱提的杜宇取代了鱼凫王的统治，号为蜀王，一号“杜主”^②，建立起古蜀的杜宇王朝，杜宇王朝的年代约为西周一代到春秋早期。杜宇王朝时期，古蜀文明在政治结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等方面出现了重要变化，国家形态日益成熟。约在春秋时代早期，古蜀王国的政权又发生了一次重要变化，“荆人”鳖灵推翻了杜宇王朝，建立起古蜀的开明王朝。开明王朝是古蜀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它的政治势力和文化影响不论较之鱼凫王朝还是杜宇王朝都更大，发展成为先秦时期中国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泱泱大国。公元前 316 年秦灭蜀，古蜀国的政治史从此结束，古蜀文明的相对独立发展进程也随之阻断，逐步汇入到统一的中国文明之中。

如果以与黄帝同时的蜀山氏作为古蜀史的开端，那么古蜀的兴衰史经历了两千多年之久。这种以一支族群称号为名所建立的古国连续发展如此长久的情况，在中国古史上是不多见的。

2. 古蜀文化的空间构架

空间构架指的是文化区的分布形态以及构成这种分布形态的诸种因素，包括中心、次中心和边缘等多级层次。

^① 司马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

^② 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古蜀文化区形成于距今约 3700 年以前^①，略与中原二里头文化相当，属于夏代纪年范围的晚期阶段。

夏商时代，古蜀文化区主要分布在横断山脉以东到长江三峡鄂西之间。它以成都平原为根据地，以广汉三星堆为中心，向东连续辐射分布到川中丘陵、川东平行岭谷，东出三峡，与江汉平原相接。在成都平原以北，跨过川北边缘山地，是又一片高原绿洲汉中盆地，它通过嘉陵江河谷与成都平原相连，是商代蜀文化区的北部边缘。在成都平原以南，顺岷江而下，即达岷江支流青衣江和大渡河流域，这里也是古蜀文化的传播辐射之地。依靠长江、岷江、沱江、嘉陵江等四条大江，凭借地理的向心形结构，古蜀文明得以形成独具一格、分布广阔的连续性空间构架^②。

西周时代，由于古蜀王国政权的更迭，使古蜀文明的运作机制发生变动，文化面貌出现一系列演变。相应地，古蜀文化区的空间分布形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文化中心从广汉稍南移至成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③，其北缘的进退不大，西缘和南缘有较大幅度的进展，东缘则保持了稳固的连续性空间。

春秋至战国时代，古蜀文化区的东部边缘由于巴国文明的入川而向川中退缩，但在西部和南部却扩展不少，又得以形成新的次级政治与文化中心。当古蜀文明全盛之时，其地域“东接于巴，南接于越（按：此指西南夷的濮越之地），北与秦分，西奄峨嵋”^④，而其影响和渗透范围，还远远超出了这一地域界限。以后，直到汉代之初，蜀文化区的演变仍未泯灭。

（二）成都在古蜀文化区中的位置

距今 4000 多年前，在我们人类所居住的地球上，从北纬 15°—40° 之间，以城市起源为主要标志的古代文明曙光，分别从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非的尼罗河、南亚的印度河、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跃然升起，普照着亚非大地。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文明，它的诞生，使人类社会最终脱离了野蛮状态。由于城市对文明社会的形成具有特殊意义，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V. G. Childe）把人类从史前进入文明的巨大社会变革称为“城市革命”。

就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几乎同时掀起了“城市革命”的浪潮，在黄河中游和下游，在河套地区，在长江中游、下游和上游地区，都出现了以城墙、城壕围筑起的最早的“城池”，标志着中国城市起源时代的来临。

在长江上游的崇山峻岭之中，镶嵌着一个绿宝石般的盆地——四川盆地。四川盆地由一系列边缘山地所围绕，又有大江阻隔，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在这一地理单元内，地势由四周边缘山地向盆地中部逐渐下降，河流也呈现为不对称的向心结构。正是这种向心结构，加上盆地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盆地容易吸引周围边缘山地经营高地农业的群体向低地发展定居，吸引各种古文化沿着下趋的河谷和山间谷地所形成的向心状地理结构走向盆地中部的成都平原，从而为古文化的交融提供自然基础，使成都平原发育出发达的古蜀文明。

① 江章华、王毅、张擎：《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考古学报》2002 年第 1 期。

② 林向：《论古蜀文化区——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 年；段渝：《古蜀文化区》，《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年。

③ 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④ 同上。

同时，岷江、嘉陵江、沱江、长江又呈放射状，将古蜀文明传播辐射到四面八方。

成都，这片有着悠久历史的地域，史前至夏代是古蜀文明的起源地，商周以来是古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古蜀地区与中原、长江中下游、华南、西南和西北地区文化交流互动的中心，是中国西南的国际交通线——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一言以蔽之，成都是古蜀地区的古代文明中心。

根据中国古史记载，最早生活在成都平原及周边山地的族群，是被称作“蜀”的几个人类族体，分别叫做蚕丛、柏灌、鱼凫的“三代蜀王”，他们都是从岷江上游高山峡谷地区，在五帝时代到夏代之间辗转迁入成都平原的。由于族群之间对土地和资源的争夺，导致成都平原大规模聚落群的产生。约在公元前 2500—1700 年，成都平原形成了以宝墩文化为代表的古城群。公元前 2000 年，古蜀国大型都城三星堆诞生。公元前 1400 年左右，以三星堆为代表的成都平原跨入青铜时代，形成了辉煌灿烂的以青铜器、城市、大型宗教礼仪建筑为标志的古蜀文明。

古蜀王国城市文明的曙光不仅从三星堆跃然升起，还从早期成都的地面上迸射而出。大量的考古资料说明，早期的成都，是一座稍晚于蜀都三星堆古城形成但却与它同步繁荣发展起来的具有相当规模的早期城市。

成都城市形成于商代中晚期，大约在公元前 1300 年左右。早期成都依江山之形，沿郫江古道呈新月形布局，城市聚合之初的核心部分是位于今天成都市区西部的金沙村和十二桥，分布面积大约 5 平方公里。城市不存在中轴线，它最显著的布局特点是一无城墙，二不成矩形，这与三星堆和华北商周城市判然有别。这种形态的城市布局，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地形地貌，另一方面在于建立适应地形地貌的城市分区功能。商周时代的成都，工商业兴盛发达，是西南地区青铜器、竹器、玉器、石器、骨器、陶器等手工业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中心，它的各种产品转输于中原、长江中下游、华南、西北和西南地区，并远销到今蒙古诺彦乌拉、朝鲜乐浪，与各地建立并保持着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关系。

从春秋战国时代直至秦汉之际，成都的早期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逐步发展成为一座比较典型的工商业城市。在四川荣经、青川等地出土了大量标有“成”、“成造”、“成亭”等烙印戳记的各式精美漆器，且数量甚大，表明这些器物产销两旺；漆器上的铭刻不用巴蜀文字而用中原文字，表明产品主要销往古蜀以外各个地区，生产的目的在于销售。联系到早在商代即已初步开通的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在成都，而以成都为中心，分布及于川东和盆周山地的广阔空间内，又出土不少南亚、中亚以至西亚文化风格的制品来看，成都这座具有工商业传统的古代都市，在这一时期已经发展成为中国西南的工商业中心。

春秋中晚期之际，随着开明王朝移都成都，成都作为全蜀政治核心的地位得以最终确立，并由此推动了成都社会经济文化的大发展。在成都市发现的东周时期遗址的总面积约为 15 平方公里^①，参照战国时期齐都临淄总面积与人口总数之比所得出的户均占地面积，以及战国时期楚郢都面积与人口数的比值^②，并参考西汉时期成都的人口数值等估算，战国时期

① 王毅：《成都市蜀文化遗址的发现及其意义》，《成都文物》1988 年第 1 期。

② 根据考古发现的临淄故城总面积与文献记载的临淄人口总数来计算，战国时期临淄户均占地为 268 平方米。见马世之：《略论楚郢都城市人口问题》，《江汉考古》1988 年第 1 期。

成都有户 55000 左右，有口 270000 左右^①。城市内布置有宫殿区、宗教区、生活区和作坊区，有王室、官吏、将军、武士、商贾、宗教人员、工人、农民、艺术师等不同等级和职业划分，蜀族、濮族、氏羌等民族杂居，构成一幅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图画。东周时代的成都，不仅是手工业品的产地和地区间各类产品的集散地，还是商贾云集、拥有“国之诸市”的贸易中心，也是大量个体工商业者聚集或出入的场所。

春秋战国时代，以成都为核心的古蜀城市网络覆盖了整个成都平原，并辐射到四川盆地周围山区，其空间组织形态具有结构性和层级性，日益表现出它的稳定性和成熟性。在这个巨大的城市网络中，协调与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功能体系分区的形成和发展。成都作为全蜀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挥着首位城市的主导功能，引领着各地经济文化向前蓬勃发展。成都以外的新都、南郑、郫城、临邛、南安、严道等城，则分别承担着军事镇守、商业贸易、文化交流等不同功能。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国城市网络体系，对整个四川盆地以及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组织、协调和推动作用。这种格局，不仅对先秦、秦汉及整个中古时代，而且对近现代四川城市网络的继续扩大和发展，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二、成都平原古蜀文明演进的地理环境与文化生态

（一）成都平原自然地理概况

成都平原介于龙门山与龙泉山之间，北起四川安县、绵阳一带，南抵四川乐山南的五通桥，长约 200 公里，宽 40—70 公里，面积约 7340 平方公里，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平原。

成都平原发育在东北—西南向的向斜构造基础上，由发源于川西北高原的岷江、滏江、石亭江、绵远河、西河、斜江、郫江、南江等 8 条主要河流重叠连缀而形成的复合冲积扇平原。成都平原地表松散，沉积物巨厚，平原中心地带沉积物厚度达 300 米，第四纪沉积物之上覆有粉砂和黏土，结构良好，宜于耕作，是四川盆地最肥沃的土壤。海拔 450—750 米，地势平坦，由西北向东南微倾，平均坡度仅 3‰—10‰，地表相对高差都在 20 米以下，渠汉密布，有利于发展自流灌溉。广阔的成都平原为成都城市的兴起创造了优越条件。

成都平原水系发达、河渠交错，由于降水量较多，河流水量充沛，地表水、地下水资源丰富。岷江进入平原后，水势减缓，多出岔道，有大小支流数十条，呈纺锤形河网，每隔 3—5 公里就有一条较大的河流，是四川盆地河网最稠密的地区。

成都平原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温度在 18℃ 左右，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足，年降水量介于 900—1300 毫米之间。亚热带温暖湿润的气候为成都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① 成都市的东周时期遗址的分布范围，从西到东约 5 公里，从南至北约 3 公里，总面积约 15 平方公里。根据有关专家对中国早期城邑人口户数平均占地数值的研究，户均占地约为 158.7 平方米，与《墨子·杂守》所记“率万家而城方三里”，即户均占地 154.2 平方米的实际情形基本吻合。如果用同一人口密度指数估算，东周时期的成都，约有户 94517，有口 472585，已超过《战国策·齐策》所记齐都“临淄之中七万户”合 35 万口的人口总数，显然偏高，这就需要寻求另一个比较合理的人口密度指数。有学者根据考古发现的临淄故城总面积与文献记载的临淄人口总数来计算，得出户均占地 268 平方米的密度指数，并据以估算出楚国郢都城人口为 30 万左右的比较合理的数字。按照这个指数计算，总面积约 15 平方公里的成都，应有户 55000 左右，有口 270000 左右。这个人口数据，小于汉代成都“户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六”（《汉书·地理志》）约合 40 万人的数字，应是比较接近历史实际的人口数据。参见段渝：《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历史研究》1993 年第 1 期。

（二）地理区位与文化凝聚

成都平原位于我国三大阶梯第二级台阶西部的四川盆地内部，它向西迎接青藏高原势力的东进，向东控临长江上游，直逼长江三峡以东，向南面对云贵高原，逼临横断山区，又北穿秦岭，交通中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上，都处于多边联系的枢纽位置，具有突出的战略区位优势，决定了古蜀文明的发生、发展与繁荣。

从地理环境看，四川盆地是一个标准的菱形盆地，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史前时代，阻隔与外界联系的盆地周围的边缘山地固然不是不可逾越，但毕竟起着极大的限制和阻碍作用。在这一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内，地势由四周边缘山地向盆地逐渐下降，而盆地则由西向东依次排列分布着盆西平原（成都平原）、盆中丘陵和盆东平行岭谷。地形的这一特点，造成了所有的河流都具有从盆地南北两侧沿着下趋的山势流向盆地、汇入川江的态势^①。而川江则以摧枯拉朽之势切开盆中丘陵和盆东平行岭谷，从盆地东南边缘流过。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乌江、赤水河等分别从南北方向注入长江，浩浩荡荡，东出三峡。

正是这种地理区位所造成的向心结构，使得成都平原处于东西南北各族群及其文化交流、互动和交汇的中心位置，从而为各种古文化在成都平原碰撞、融合以至汇为一流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地理条件。这样，成都平原古文化的发展轨迹也就相应地呈现为一个向心结构，对文明起源、城市起源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凭借地理的向心形结构，古蜀文明得以形成独具一格、分布广阔连续性空间构架。

这里不妨以构成古蜀文明源头之一的蚕丛氏为例予以说明。蚕丛氏原为西北氏族的一支，发源于岷江上游河谷，约在夏代前后便已辗转移徙到达成都平原^②。蚕丛氏本来就是以一个经营高地农业的部族登上史前史舞台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汶山郡有“六夷七羌九氏”，其中“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的部族就是冉駹，即蚕丛氏后裔未南迁进入低地平原的一支。因为这既同于蚕丛“居岷山石室”^③，同时“冉駹”的读音也与“蚕丛”相近^④。这就说明蚕丛氏早已成为定居部族，而定居通常是与农业的发展有密切联系的。《魏略·氏传》记载西晋以前氏人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和家庭手工业^⑤，虽然年代稍晚，但从汉初蚕丛氏后裔冉駹的情况看，蚕丛时代已产生了粗放的高地农业却是可以肯定的。四川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和沙乌都遗址所出大量陶器和生产工具^⑥，就可作为蚕丛氏主要经营农业的实物证据。

作为一个高地农业部族，在条件允许情况下，通常具有向低地农业区移民的发展趋势。《剑桥古代史》第1卷第1分册的作者根据对伊朗高原以西家畜和种植作物的最早中心地的研究成果，断言近东、中东农业和农村的最早发展是在高地，而低地平原的农业则出现较晚^⑦。根据徐中舒教授研究，中国上古时代实际上也存在一个高地农业和低地农业问题，而作为商周时代生产力最高指标的井田制，就是在高地农业基础上从肥沃低地逐渐发展起来的

① 长江自青海玉树至四川宜宾一段，称金沙江。金沙江全长2308公里，是长江的上游。长江自四川宜宾至湖北宜昌一段，习惯上称为川江，全长1033公里。参考《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

② 段渝：《论蜀史“三代论”及其构拟》，《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6期。

③ 《古文苑》章樵注引《先蜀记》。

④ 蒙默：《试论古代巴、蜀民族及其与西南民族的关系》，《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

⑤ 《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

⑥ 蒋成、陈剑：《岷江上游考古新发现述析》，《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2期。

⑦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1, NO. 1, 1970, P. 251.

田制^①。中国西北部的氐羌也是如此。氐羌同源异流，《逸周书·王会》孔晁注：“氐（低）地羌不同，故谓之氐羌，今谓之氐矣。”古“氐”、“低”二字恒通^②，氏族实际就是从羌族中分化出来后由高地向低地发展并经营农业的族类。

蚕丛氏活动的岷江上游地区属于高山峡谷地貌形态，山势陡峭，河谷狭小，气候干寒，只适合粗放农业。而沿着岷江河谷下行，不远便南出山区，进入辽阔的岷江冲积平原——成都平原。因此从地理上看，蚕丛氏所以向盆地平原移民，就是因为那里的自然条件更加有利于农耕的缘故。这也是古代社会的氏族部落为适应生态环境而迁徙的一个生动例子。

成都平原的地理向心结构对古文化的凝聚，还可从考古学上加以认识。在古文化的地域分布上，成都平原及其四周发现的许多文化面貌各不相同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遗址或遗物，大都呈现出朝向成都平原发展的趋势。例如，岷江上游营盘山遗址出土的陶器，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所出陶器有一定的关系，但年代比宝墩文化为早^③。又如，四川盆地以北嘉陵江上游地区的张家坡和邓家坪遗址^④，在石器、陶器等方面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有一定联系，年代上则比宝墩文化早一两个阶段，可能是宝墩文化的来源之一。^⑤再如，在三星堆文化的陶器中，有一些来自中原文化的因素，而在三星堆青铜文化中，又有较多的商文化的因素，它们都分别构成三星堆文化的来源和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由此可见，成都平原各个遗址，在古文化内涵上多蕴涵了四周各地古文化的一些因素，它的早期文明是汇聚了各种古文化而得以发展的。

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若干古文化在某一个多少被地理环境所隔离、所防护而自然条件优越的区域中的汇为一流^⑥。成都平原由于地理区位所造成的向心结构，正是它能够成为自古以来文化交流和各族汇集的中心所在的自然基础。成都平原文明起源时代古文化遗址中众多各具特色的文化成分的汇集、融和现象，清楚地展示出了这一点。

另一个事实是，治水工程的需要，促进了整个平原地区各族在某种程度上达成的协作，并以此为动力加速平原的一体化，终于使古蜀成为地域辽阔的早期国家。从史籍可见，到春秋中叶的开明王国时期，蜀已能完成大规模的治水工程，治水的范围也不仅限于古蜀的腹地玉垒山（今都江堰市境内）和金堂峡^⑦，还向南发展到盆地边缘青衣江旁的乐山^⑧，并在那里留下了治所的遗迹^⑨。另据考证，开明氏“决玉垒以除水害”实际是开掘一条人工河道，分引岷江水流入沱江，而这一工程全靠人工开凿疏浚^⑩，工程量之浩大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一个集中统一的政权对人力、物力的统一支配和征发，这一工程是难以实现的。反过来看，治水范围的扩大和对水利工程的统一规划与组织，恰好表明蜀王的权力已达到高度的集中和稳固。岷江泛滥是川西平原自然环境的一大特点，建立在这种自然基础之上的人类对大自然

① 徐中舒：《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

② 《说文·氐部》“氐”字下段玉裁注。

③ 蒋成、陈剑：《岷江上游考古新发现述析》，《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2期。

④ 王仁湘、叶茂林：《四川盆地北缘新石器时代考古新收获》，《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

⑤ 江章华、王毅、张擎：《成都平原早期城址及其考古学文化初论》，《苏秉琦与当代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⑥ 柯斯文著，张锡彤译：《原始文化史纲》，三联书店，1957年，第250—251页。

⑦ 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一六四；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六七。

⑧ 邓少琴：《蜀故新论》，《巴蜀史迹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7页。

⑨ 郦道元：《水经·江水注》。

⑩ 董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7—108页。